

摘译

6

1976

外國哲學
歷史經濟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6

1976

上海人民出版社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一九七六年第六期(总第十八期)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上海陕西北路186号)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5 字数111,000

1976年6月第1版 197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0.38 元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 关于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问题 •

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	[美] 马丁·尼古拉斯 (1)
一、新统治阶级的基础	(2)
二、“阶级消亡论”解除了苏联的思想武装	(8)
三、赫鲁晓夫的崛起	(14)
四、修正主义得逞了	(21)
五、赫鲁晓夫巩固了阵脚	(28)
六、苏联工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被剥夺了	(34)
七、利润挂帅	(41)
八、柯西金压制“怠工”	(48)
九、柯西金篡改列宁的论点	(54)
十、推行血汗工资制	(60)

• 匈牙利反革命事件 •

读一点匈牙利事件的史料	晓 阳 (68)
匈牙利事件	[苏] B·列昂诺夫 (71)
关于匈牙利事件	[美] 斯蒂芬·D·克尔特茨 (86)

• 二十年代苏联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

- 一九二七年发生在苏联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92)
反对派反苏维埃的表演 [苏] 《真理报》 (93)
反对派在游行队伍中 [苏] Я. П. (97)

• 超级大国的没落 •

- 一种唱挽歌的气氛 (99)
我们的第三世纪的任务
..... [美] 埃米特·约翰·休斯 (101)
开拓者和移民 [美] 本杰明·夸尔士 (109)
美国经验：开国元勋树立的榜样
..... [美] 亨利·斯蒂尔·康马杰 (116)
独立：新美国的诞生 [美] 《时代》周刊 (124)

• • •

- 罗马尼亚游记 [美] 唐纳德·商奈尔 (134)
蒙哥马利：阿拉曼战役的传奇式人物
..... [美] 《时代》周刊 (149)
俄国式的缓和 [法] 让-弗朗索瓦·勒韦尔 (152)

关于资本主义在
苏联复辟问题

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

〔美〕马丁·尼古拉斯

编者按：《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是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九日到十月二十二日连载在美国《前卫》周刊上的一组文章。文章力图分析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和原因，可供参考。作者是美国《前卫》周刊的外事编辑。

这一组文章原来的题目是：《苏联是资本主义国家吗？》，一九七六年汇编成书时改成现名。全部文章共二十八篇，本刊选取了后二十一篇，分别在一九七六年第六、第七两期连载。

本组文章由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资料室、辽宁大学经济系苏联经济组和天津市历史研究所翻译室合译。

一、新统治阶级的基础

新生的资产阶级

苏联的经历清楚地表明：旧社会的残滓余孽（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资产阶级和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耐普曼^①以及富农），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发生的剧变中并未起主导作用。虽然这批仍然留居在苏联国内的残滓余孽，在五十年代中期还很年轻力壮，有可能在政治上发生作用，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资产阶级出身是取得党籍的障碍，使他们绝对没有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的资格。

一九五九年，美国金融寡头兼外交家艾夫里尔·哈里曼在他写的一本回忆苏联旅游的书中讥讽地提到了这一点。他在苏联会见了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书中引用了赫鲁晓夫的话：

“我原是一个出身卑微的工人。起初是个放羊娃，后来被提升为放牛娃，最后在矿上找到了工作，一直干到十月革命。”

哈里曼继续写道：“同副总理科兹洛夫和外长葛罗米柯一同参加谈话的副总理米高扬，好象生怕别人超过自己似地插嘴说：‘我是皮匠的儿子。’科兹洛夫说：‘我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甚至在会谈中一直沉默寡言的葛罗米柯也大声说：‘我是贫民的儿子。’我对他们说，你们都象那些发表竞选演说的美国政治家那

^① 耐普曼，俄语 НЭПМАН 的音译。指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家、商人和投机者。——译者

样自夸出身清贫……”^①

简而言之，斯大林逝世之后发生的篡政夺权不是属于被剥夺的老资产阶级的复辟，而是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产生的新资产阶级的崛起。但是，这个新资产阶级是从哪里产生的，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农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是农业，特别是集体农庄。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②虽然苏联集体农庄已不再具有列宁所说的这种小生产的特征，但是仍然存在着足以构成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土壤。

不仅自留地是个问题。更成问题的是集体农庄财产的所有制形式。从农庄庄员使用的全部土地和主要农业机械（拖拉机、康拜因等）归无产阶级的国家所有这个意义上讲，集体农庄的财产是社会主义财产。但是，除了这些主要的和某些次要的限制（诸如物价管制）之外，每一集体农庄对其它农庄和对国家的关系很象一个牟利的私营企业。尽管一个集体农庄可以组织数千人从事生产，但是，同国营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的生产规模和计划的整体性相比，集体农庄生产仍然是小规模、而且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生产。

在斯大林最后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他对集体农庄以及和这种形式有关的商品交换关系，明确地提出

^① 艾夫里尔·哈里曼：《和俄国和平吗？》，1959年纽约版，第17页。

^②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81页。

了警告：“但同时这些现象已在开始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强大发展，因为它们造成一种障碍，妨碍把全部国民经济、特别是把农业完全纳入国家计划，如果看不出这点，那就是不可原谅的盲目了。不容置疑，愈向前去，这些现象就会愈加阻碍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所以，任务就在于，通过把集体农庄所有制逐渐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办法，通过以产品交换制——也是逐渐地——代替商品流通的办法，来消除这些矛盾。”^①

赫鲁晓夫等待时机

我们从以后发生的事件中得知：苏联国内和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同意斯大林的这种估计。他们也不同意斯大林反对把机器和拖拉机出售给集体农庄所作出的禁令。斯大林写道，这种建议必然会走向“复活资本主义”。^②（几年以后，赫鲁晓夫把斯大林在这本书里批判过的许多事情付诸实施，其中恰有这项建议。）然而，无名小卒萨宁娜和温什尔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出这一建议时，赫鲁晓夫和党的其他高级官员都没有站出来表示赞成，这是意味深长的。对斯大林的这部著作组织过公开的讨论，全党都奉命参加，但是，如果赫鲁晓夫在一九五二年已经同意萨宁娜和温什尔一伙的意见，他也会秘而不宣。在公开场合，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伙热烈地同意斯大林的意见。可是时隔不久，就反其道而行之。这类手法是苏联新资产阶级的特征。

农业的发展，虽然在苏联社会主义时期及以后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是，五十年代中期政治事变的幕后领导力量看来并不来自农业方面——这个最明显和公认的资本主义温床。在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7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4页。

② 同上书，第74页。

斯大林逝世后掌权的绝大多数主要的新资产阶级头面人物，例如赫鲁晓夫和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都有着侧重于工程或工业方面的党务工作的经历。

斯大林时代削弱了经理的权力

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时期，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特别是企业经理，处于非常矛盾的地位。他们的责任重大，甚至超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经理，但是，真正的权力却比资本主义企业的经理要小得多。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苏联企业经理（或厂长）是个人负责制，要负责组织人事、技术和会计等方面的生产过程。按照列宁在二十年代初期主张的“一长制”管理原则和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拟订的其它措施，企业管理的责任集中在个人身上。这个原则旨在克服生产混乱、生产中断和无人负责等现象。在工人们自发地没收工厂和幼稚地“自己管理”等活动的初期，这些现象简直是层出不穷。后来，“一长制”原则被保留了下来，甚至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有某种程度的加强。在“一长制”下，经理的责任事实上比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厂经理的责任更为繁重，因为苏联的经理在技术上和在法律上都受经济计划的制约。经济计划中相当详细地规定了生产的品种和生产的时间。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强调：“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①这就是说，经理不完成计划就是犯法，可以把他送到法庭受审；如果发现犯有故意破坏的罪行，就可以作为破坏分子处以死刑。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80页。

尽管苏联经理身负繁重而严格的责任,但是,他们对工人的权力通常比资本主义社会的经理小得多了。他们过去确有强大的权力,特别是在三十年代初农民大批流入城市的工业化运动时期,他们有权分配工人干不同工作,有权用罚款来惩治迟到和旷工的工人,或用别的办法来“办厂”。但是,他们不具备资本主义社会经理拥有的最重要的权力,即任意解雇工人的权力。苏联经理不能以失业和饥饿来威胁工人。

这就具体说明,苏联的劳动力已不再是可以买卖的商品;它的价格(工资)不再由于相对过剩的失业大军的存在而下降,而且商品买主的不可剥夺的拒购权力(拒雇或解雇权)都不再为人们所承认了。除了作战时期之外,工人可以自由辞职;但是,假如经理不能证明工人触犯刑法,他就不能解雇工人。经理既然没有控制工人的权力,也就软弱无力。

工人的权力受到保护

此外,工人们有多种办法来对付滥使用权力的经理。英国资产阶级学者玛丽·麦考利写道:苏联设有特别法庭审理工业争端。在这种法庭上,只有工人有权申诉。经理不得作为原告,只能在处于被告的情况下出庭。^①甚至在案件提交法庭之前,工人也有办法使讨厌的经理知道该谁当家作主。办法之一是生产会议。资产阶级学者大卫·格拉尼克在他的《红色经理》一书中描述道:

“工厂的管理工作是在受到严格的思想限制和具体的困难情况下进行的,还要力图避免工人的批评。一个工厂经理……暗示,生产会议对他来说是一场真正的严峻考验。但问到工人

^① 玛丽·麦考利:《苏联劳工争端》,1969年牛津版,第54—55页。

是否敢于公开批评时，他说，‘任何压抑批评的经理将受到严厉惩罚。不仅会被撤职，而且会受审判。’”^①

经理们占居上风

从长期来看，经理的职责重大而权力甚小，这不是合理的现象。合理的改进办法，应该是把经理的职责逐渐转交给工人，以便使经理的职责和他们的权力相称。但是，由于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经理们就先发制人了。他们一方面把工人的权力大部占为己有，另一方面又推卸经济计划强加给他们的责任。经理们的这两种倾向，都是出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动机。这种现象，在斯大林时期不断地受到制止和镇压，但是，它们的根源未被消除。斯大林逝世之后，新的领导一旦牢固地控制了党，经理们便在报纸上发泄他们积郁已久的、权微而任重的不满情绪。随后，包藏在这种不满情绪中的要求全部得到了满足。

^① 大卫·格拉尼克：《红色经理》，1960年纽约版，第230页。

二、“阶级消亡论”解除了 苏联的思想武装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从外表上看，苏联共产党和政府是空前的强大、巩固，可是，在这坚实的外表里面，却隐藏着种种蜕变，使得这个社会主义的堡垒，随着历史的变迁，不知不觉地被一小撮挥舞反马列主义纲领的反革命头目占领了。

要了解这个转变是怎样得逞的，倒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没有前例可以凭借。能够透露特殊事件的主要文件大部分弄不到手，因为许多事情是在秘密之中进行的。可是，只要仔细地注意一下发展的结果，就可以识别出导致这一历史倒退的四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残余在党和政府最上层里的反映。前面说过，集体农庄中还保留着一定程度狭隘的、本位的、唯利是图的和无政府行为的客观基础，这是资本主义的标志。在工业生产上，个别经理和工程师拥有过多的职责，使得他们产生了某种优越感，并且要想抓权。在工、农这两个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里，基层领导不得不把一只脚趾，甚至是一只脚，站在资本主义或者半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办事。于是，在他们的头脑里，就不能不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产生更为向往资本主义、而不是向往共产主义的愿望。在大多数人的思想里，这种想法，如果是在最露骨的形式上出现，无疑地会很快受到抑制；如果以伪装的形式出现，对于许多人就有

重大影响,而且可以预料得到的是,这样的想法在少数人的头脑里,会成为完全处于主导地位的推动力量。

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残余

上面所说的种种情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难以避免的,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它不仅带来了许多旧思想,而且还保留了一些旧土壤。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必然要受到马克思称做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影响;工资制度的不平等,加上苏联常有的个人额外津贴和奖金,这些都是和苏联工人阶级最卓越地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热情和不计报酬的劳动态度背道而驰的。

社会主义社会基础里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残余,也不可避免地要渗透进党和政府等高级领导机关。在无数的集会、访问和会议之中,苏联各级干部每天都碰头,现实的落后方面和基层的思想,一定会和进步的方面一样同时都反映给上级。集体农庄主席的内心动机和富农没有什么区别,工厂经理渴望控制工人,工程师妄想成为天才,党的中、下级干部想要特权——所有这一切必然迟早要在上级机关找到或形成他们的代表,即既懂得怎样隐瞒、也懂得怎样增进他们的利益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一类骗子、野心家、大坏蛋,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的必然产物,正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辉面(这是主流)必然会产生斯大林这样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者、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马列主义的伟大导师一样。

苏联党和政府高级干部中存在着两面派、野心家和机会主义分子。这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些人总是会不断产生。只要社会还处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这样的人就会象资

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头那样，想方设法向上爬。揭露和清除一、两个这样的人，并不会使其他野心家沮丧，而只会使得其他人变得更加狡猾。这就是资产阶级为什么能够在苏联篡权的第一个原因。

除了这个多少是带有必然性的条件之外，在苏联历史的这个特殊时期，还有一个非必然性的情况。这个情况，由于主客观的因素，给党里的坏人提供了做坏事的方便，而且更有得逞的机会。

放 松 了 警 惕

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苏联的党和政府在国内外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显得空前强大。在第二次大战中，苏联先是避开敌人，后将敌人击退，最终粉碎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到一九五〇年，它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已成为一个包括欧亚大片土地和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

在国内，遭受战争破坏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重建，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大发展使生产在较短的时期内大大超过战前水平，而且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国家战后复原中特有的失业问题。虽然苏联党和政府还有很多问题要处理，但是他们仍有理由歌颂胜利。他们取得的成就的确是伟大的。

历史的这种环境不可避免地使许多赢得胜利的领导干部产生自满情绪，甚至一些赤胆忠心的干部也感到可以躺在功劳簿上，安享荣华，吃干饭，不做事了。在一九六八年，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曾经叙述过这种不良倾向在斯大林逝世前几年的发展情况：

“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英勇奋战的布尔什维克党员，

都是家庭出身好、革命干劲足的干部。他们在革命中，在战斗中，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在反对托洛茨基、‘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叛徒的斗争中，得到了思想上政治上的锻炼。他们对于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对于列宁和斯大林，对于他们制定的正确路线和规范，都深信不疑。

“对于他们说来，党就是一切，党是他们的心、他们的脑、他们的眼。这就是他们保卫党的理由。他们接受了党和伟大领袖的教育。但是，苏联的干部在努力执行党和斯大林的正确路线和规范的同时，起初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显的而是逐渐地感染了贪图安逸的情绪。这种情绪，是和革命发展不相符合的……工作上的成功滋长了自满情绪，因此，苏联的干部开始失去无产阶级的简朴本质，并且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但是，他们认为这些要求在‘政治上是合法的’，因为这些人都会辛勤工作，英勇斗争。他们提升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以后，贪图安逸和自满情绪也逐渐发展起来，而且他们更多地受到官僚主义、智育第一和技术至上的感染……许多干部不象从前那样虚心接受群众的意见了。他们开始认为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比群众强。他们高居于群众之上，自认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比工人阶级高明，而且更具有远见。这些干部把布尔什维克党和斯大林在苏联群众和工人阶级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同他们个人的威望混淆起来。所有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瓦解了这些干部的革命意志，也影响党的路线和路线的执行。党的革命的标准虽然在形式上还存在，党本身的生命和党的组织以及整个苏联国家的行政却在不断地僵化。”^①

总之，苏联党内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出现几个机会主义分子，

^①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1972年地拉那版，第419--421页。

而且还由于革命警惕性不强，以致于不能揭露和打倒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忠诚的无产阶级干部没有识破隐藏在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分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和他们勾结在一起，因为这些干部自己也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可是，如果不是由于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在二十多年前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和理论错误的话，仅具备上述两个条件，还不能保证修正主义者篡权阴谋得逞。斯大林的这个错误一直没有得到纠正。这个错误，就是斯大林早在一九三六年公开提出的一个论点：苏联已经成为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一直认为，苏联“……没有阶级冲突……”。^① 所以，苏联社会内部再没有产生资产阶级和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甚至这种可能性也没有了。复辟的危险只来自外国的武装侵略。即使在他最后的一本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斯大林只是作了这样的纠正：“……当然，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它们不了解生产关系有改变的必要”，^② 但他仍然坚持并无真正的危险，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那些能够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③

由于斯大林的理论有这个大缺陷，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领导的一系列教育运动、纯洁文化的措施和全党范围的理论讨论，都不足以鼓励和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不能使自满的人有所警觉。这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缺乏生气，运动的矛头并没有击中问题的要害。在这个主要问题上，斯大林的理论发展跟不上实际运动的需要，而且也没有给运动以革命的指导。这就是修正主义为什么能够得逞的第三个主要原因。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35页。

②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7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0页。

③ 同上书，第40页。